

刘世南 著

在学术殿堂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在学术殿堂外

刘世南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学术殿堂外 / 刘世南 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

(中华学人丛书)

ISBN 7-5034-1234-8

I. 在… II. 刘… III. 文化 - 学术 - 研究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616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韩淑芳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 / 32

印 张: 6.375 字数: 17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插页: 2 页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34-1234-8/K·0853

定 价: 16.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印刷厂负责退换。

序

业师刘世南先生将他一生治学的体会以及多年来指谬的文章,集结为一书,名曰《在学术殿堂外》。先生名其书曰“在学术殿堂外”,似乎是无关学术宏旨,其实,先生书中所言,句句皆学术中事,无一非关学术者。归纳起来,先生于书所述,主要是三大部分:一是从先生自己几十年的治学体会谈如何打好基础、培养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人才;二是将他多年来对学术研究、古籍整理匡谬正俗的文章加以结集;三是披露了先生多年来与钱钟书等学者学术交往的情况,由此亦见先生的学术功力和学术襟怀。我因为帮忙整理和电脑输入的原因,得以先睹为快。拜读业师大作,犹如又回到当年受业之时,耳提面命,言犹在耳。

记得研究生刚入学时,先生便一再强调打基础的重要性。其时我因已在高校教过几年古典文学,自恃似还有一点基础,对先生之谆谆教诲并不在心。大概先生看出我的心思,又说,他曾经同朱东润先生交谈过,朱先生说,现在大学里有的年轻教师,就凭着北大编的文学史参考资料和我主编的作品选给学生上课,这怎能教好书呢?后来,先生告诉我们,说他年轻时会背《诗经》,甚至《左传》,我真是不胜惊讶。如果说会背《诗经》尚不奇怪的话,能背《左传》这样的巨著,谈何容易!然而,后来先生给我们上《左传》专题课,从先生对《左传》的熟悉程度,我才领会先生诚非虚言。先生没有上过大学,但从少年起就跟着前清秀才的父亲读了十二年的古书,熟读了《小学集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书经》、《左传》、《纲鉴总论》等古书,而且“全部背诵”!其实不止

这些,先生对“十三经”,对《文选》,对《庄子》,对史籍,对词章学,都下过很深的工夫。现在的中青年学者,有几个人下过这样的工夫?前几年,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曾感叹说,我们现在谈的许多看法、发的感慨,其实古人全都说过。我想,正因先生熟读了古人之书,才有话都被古人说完的感叹。就象清人赵翼说的:“古来佳句本无多,苦恨前人已说过。”不但诗如此,文亦如此,理亦如此。而似吾辈读书不多者,一有所论,即沾沾自喜,殊不知古人早已有之。所以,真正能做到“发前人之所未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生从来是手不释卷的。记得当年我们师徒常一起徜徉于校园之中,先生除了谈读书,别无他辞。先生平生无任何嗜好,惟以坐拥书城为乐。我研究生毕业之后,有好几年,先生都是在除夕下午给我写信。记得有一次信上说:现在是除夕下午近4点钟,图书馆阅览厅里只有我和张馆长两人;张馆长亲自值班,坐在阅览厅陪我,等我读书读到4点关门,现在正看着我微笑。所以,先生在《清诗流派史》书后诗云:“忆昔每岁除,书城犹弄翰。万家庆团圞,独坐一笑粲。”实乃真实写照。

先生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强调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广博的基础上力求专精。先生是既博且精的。拜读先生纠谬的文章,首先是叹佩先生学识的广博。因为读书广,而且不是泛泛涉猎,所以一看别人的文章或点校的古籍,很容易就可发现错误。现在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又究竟读过多少书呢?先生“刊谬难穷时有作”所指出的错误,主要原因就在于读书不多所致。自己现在也在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并时时告戒他们要广读精读以至背诵原著,然而青年学生最不肯下苦功的就是读原著,尤不屑于背诵,只是热衷于看别人的论著,拼凑自己的观点。如此,何以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家?至于说专精,只要看先生的《清诗流派史》就可以知道。先生自己说“卡片漫盈箱,有得逾美膳。心劳十四载,书成瘁笔砚”、“自我肺腑出,未尝只字纂”(该书《后记》自著诗)。先

生精研清诗十五年(从积累来说远不止15年),竭泽而渔,殚精竭虑,才完成这样一部“前所未有,后不可无”(顾炎武语)的巨著,被称为传世经典之作,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且,这种耐得住清苦寂寞、“不以学术殉利禄”的精神,又哪是当前浮躁学风所能比拟的?

从1979年开始,先生就对郭沫若、毛泽东以及包括一些学术大家在内的学者的学术错误或学术观点进行批评商榷。这显示了先生的深厚学殖,也表现了先生“当仁不让于师”的学术勇气。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出版后,是有很多人并不赞同的,但鉴于“文革”时的气候,即使人有腹诽,也不敢公开发表异议。79年刚刚拨乱反正,先生对郭老《李白与杜甫》一书进行批评的文章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而《关于宋诗的评价问题》一文,明确地说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对宋诗的否定是不符合事实,这在八十年代初引起很大反响,也是势在必然。先生这两篇文章,完全建立在充分说理的基础之上,立论有据,“极有理致”(程千帆先生语)。读先生匡谬正俗的文章,首先是钦佩先生知识的广博,学术眼光的犀利。先生纠谬,不但指出错误,而且征引大量的文献资料说明错在哪里,使人心服口服。其次亦深深感到学术研究之事,何可一丝一毫掉以轻心,非极其严谨不可从事。记得当年受业之初,拜读先生《谈古文的标点、注释和翻译》一文,心常戒惕;后来又常读到先生对古籍整理的指谬文章,更深感古籍整理研究的不易。当今学风浮躁,许多古籍整理的东西不少是仓促上阵,又为功利目的所驱使,率尔操觚,出错实不足为奇。可先生指谬的对象,有不少是知名学人,应该说学术功底都是不错的。然而只要一不小心便要出错,甚至貽笑方家。先生说:“注释不是依靠工具书就能做好的,关键在于读书。也就是说,根柢必须深厚、紮实。否则必然是盲人扪象,郢书燕说。”此说可谓至理名言,足为我辈后学龟鉴。

先生治学的另一个经验,就是多向学术大师请益和对话。先生善读书,善发现问题。一发现问题,便向一些知名学者请教,从年轻时起就是如此。先生与马一浮、杨树达、王泗原、马叙伦、庞石帚、钱钟书、吕叔湘、朱东润、程千帆、屈守元、白敦仁等学者都有论学或诗作信函往来。与学者高人对话,可以得到很多教益和启发,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对话总是建立在一个基本差不多的平台上。与学者大师对话,是必须具备相应的水平的。可以看到,不管是对话,还是切磋,学者们对于先生的见解都是相当钦佩的。像杨树达先生称赞他二十四岁写的《庄子哲学发微》是“发前人之所未发”;钱钟书先生称他的匡谬正俗文章“学富功深”、“指摘时弊,精密确当,有发聋振聩之用”;屈守元先生称其《清诗流派史》“既扎实又流畅,材料丰富,复有断制,诚佳作也”,并作诗说“卓见显才识”,“摩诃有高论”,甚至称“有幸读君书,竟欲焚吾观”;皆非泛泛溢美之词。学术就在这样的交流、讨论、切磋中长进。“平生风义兼师友”,增进学术共有时。先生谈的何止是师友情谊,其实是治学的一个重要方法。

先生谈他对培养古典文学研究人才的七点意见,我认为非常值得后辈学人记取。打好根柢、博览群书,这是培养古典文学研究人才最基本的两条。看到这些意见,或许有的人会认为先生是一位守旧的学究。此实大谬不然。先生旧学根底扎实,但从不排除新学,反而很注意吸收新东西。这一点,由先生从年青时起就广泛阅读英语著作可以看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新理论新方法风起云涌,好不热闹。对此,先生同样很认真的关注过,然而,先生不久就发现,仅仅靠新方法并不能解决问题。尤其是有的人没有读过多少古书,仅凭一点所谓理论上的“创新”,便欲在古代文学研究的海洋中弄潮,终未免是隔靴搔痒,或比附牵合,甚至保不住要出错。所以,没有扎实的根底,徒然变换一些理论和方法,只是“空手道”而已,是为先生所不取。对此,先生常深怀感慨。现在不少

学者提倡回归本体,精读元典,与先生所倡,正不谋而合。先生认为,即使进入电脑时代,也不能完全代替读书打基础。这是有道理的。诚如先生在批评有人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的误解时,不但指出王勃套用了庾信的《华林园马射赋》,而且举了宋王观国《学林》、宋王楙《野客丛书》、晚清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刘勰《文心雕龙》、欧阳修《昼锦堂记》等古籍加以论证。如果不是博闻强记,就未必能如此举证。古典文学研究,最忌单文孤证。先生如此征引,宏富有力,令人信服。这就是真正的学问!所以先生曾一再强调,做研究必须力求把资料搜罗齐备,才好动手。此外,先生还主张古典文学研究者要学会写古文、骈文、旧体诗词。先生的旧体诗词、古文和骈文都是做得很好的。吕叔湘先生称他“古风当行出色”,庞石帚先生称其诗“颇为清奇”,“不肯走庸熟蹊径”,朱东润先生称其诗“深入宋人堂奥,捶字炼句,迥不犹人”,都称赞有加。记得当年我们与先生以及另一位导师刘方元先生(钱基博先生门弟子)一起出外访学,方元先生是每日作诗一首,世南先生虽不每日作,却也诗兴浓郁,佳作不断。两位先生的诗作好之后,都让我们一起评读。在火车上,世南先生还总爱出对子让我们对。一路上既长了知识,又增添了不少乐趣。我想起陈寅恪先生曾说作对子是最好的训练。世南先生此举,实在是用心良苦。至于古文,读一读先生的《袁汪生文》,就可以略知一二了。总之,我认为先生与许多前辈学者都说得极是,作为一个古代文学研究者,自己不会作古诗词、文言文,没有感性体会,对于古人的诗文研究,总归隔着一层。惭愧的是,辞章之事,我至今未得入门,思之常感汗颜。

先生已是八十高龄的人了,仍孜孜不倦在读书写文章,而且还兼着《豫章丛书》首席学术顾问之职,实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先生的大作,是可以常置于案头的,常读常新,使人戒惕,启人心智。我把先生的手稿给研究生们都看了,希望他们能记住先生⁶⁴

教诲。薪火相传,把前辈学者的好学风传下去,发扬光大。

祝愿先生健康长寿,为学术作出更大贡献。

受业弟子郭 丹谨记 2003.4.15

目 录

序	郭 丹
一 勿以学术殉利禄	(1)
二 治学重在打基础	(10)
三 刊谬难穷时有作	(19)
四 平生风义兼师友	(38)
五 我自当仁不让师	(90)
六 怎样培养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人材	(152)
七 不能再轻视基础培养了! ——谈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174)

一 勿以学术殉利禄

2001年6月11日,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则杰博士,寄了一份复印件给我,题为《二十世纪清诗研究的历史回顾》,作者是张仲谋博士,此文发表于1999年《泰安师专学报》第21卷第5期,当时他是徐州师大中文系副教授。在此文中,他举出九种著作,称之为“经典性成果”。一为总集、选本与工具书:(1)徐世昌《晚晴簃诗汇》;(2)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3)钱仲联《清诗纪事》;(4)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二为个人研究专著:(5)钱钟书《谈艺录》;(6)汪国垣《汪辟疆文集》;(7)钱仲联《梦苕庵论集》;(8)刘世南《清诗流派史》;(9)严迪昌《清诗史》。而对于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的一批研究专著,认为严著《清诗史》和刘著《清诗流派史》是“标志着这一时期清诗研究发展水平的。”

看了张文后,顿生空谷足音之感。因为《清诗流派史》1995年通过郭丹(我带的研究生,现为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导)联系,在台北文津出版社以繁体字出版,印数只一千册,定价新台币480元,约合人民币100元,以大陆书价而论,实在太贵,加以购买不易,寄费又高,所以,我很担心这部书会默默地被淹死,不为学术界所知。现在看到张文,才知已有知音,而且给予这么高的评价,我确实非常惊喜,便特地送给我校(江西师大)文学院副院长刘松来(也是我的研究生,和郭丹同班,现为中文系教授)看,他也很高兴。

由于年老(我生于1923年夏历9月6日),睡眠较少,这晚醒后,就在枕上口占了七律一首:“附骥汪钱谁则可?策勋翰墨我非伦。欲从心路窥民主,好与尧封企日新。健者当为诗外事,高歌还

望眼中人。亭林能狷羽琤侠,绍述只惭笔不神。”开头的两句并非谦虚,我确实自知学识距离汪辟疆、钱默存、钱萼孙三位前辈太远。三、四句说明我写《清诗流派史》的目的。我不是“为学问而学问”,写这本书,重点在(1)通过吴兆骞说明专制高压会使人“失其天性”(P137),(2)通过谭嗣同说明民主意识的产生及其巨大意义(P579),钟叔河在《关于曾国藩家书》中说,“传统的封建文化不能导向民主与科学”,我这一部分论析正可证明他这个结论。吴江在《三谈中国传统文化》(收在《文史杂论》一书中)也可参看。李泽厚《探寻语碎》也指出:“近代的自由民主,正如马克思主义一样,是在大工业生产基础上逐渐成熟的成果,它与中国传统并不相侔,而是自西方输入的”。(P392)(3)通过释函可说明韧性战斗的重要。以上三点,我特别拈出,以为读吾书者告。杜甫《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更觉良工心独苦。”苏轼解说:“凡人用意深处,人罕能谕,此所以为独苦。”我非良工,但此微意,愿与读者共谕共勉。五、六句指出学者必须同时是战士,从而寄望于朱则杰、张仲谋等中青年学人。结尾二句指出不入流派的顾、龚两位思想家是我们清诗研究者的光辉榜样,我个人是“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

过了六天,即6月18日,下午,我正在中文系资料室看报,忽然间,几位古典文学教研室的中青年教师涌进来,对我说,北京中华书局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副总编李岩,他们特来了解江西师大的科研情形,今天下午在二楼开座谈会。会上,刘松来以我的《清诗流派史》为例,列举张仲谋《综述》的评论,说明大陆并非没有水平高的专著,不过处此市场经济环境,无法找到出版机会,只好去台湾出书。李氏听了,很感兴趣,便问松来找一本来看看。李表示要带回北京认真阅读。——后来松来告诉我,正是为了促成我这本书能在中华重印,所以,中华两位来宾游览滕王阁和八大山人纪念馆,系里本来不是派他陪同,他却自告奋勇陪了他们一段时间。

6月23日晚,我又在枕上口占了一首七律:“颓龄可制亦何求?剩付骨灰逐水流。刊谬难穷时有作,赏音既获愿终酬。人心纵比山川险,老我已无进退忧。差幸穷途多剪拂,书成或不化浮沍。”

我为什么写五、六句呢?清人纪昀(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感叹:“天下唯同类可畏也。凡争产者,必同父之子;凡争宠者,必同夫之妻;凡争权者,必同官之士;凡争利者,必同市之贾。势近则相碍,相碍则相轧耳。”我在江西师大60周年校庆时,应校庆办秘书处之约,写了一篇《我在师大二十年》,收在《穿过历史的烟云》一书中,由江西高校出版社于2000年10月出版。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我在师大二十年

中国古代文人写《士不遇赋》的有好几位,董仲舒、司马迁、陶渊明都有同题之作。我忝附士林之末,所遇恰好相反,在江西师大这二十年,来自领导、前辈、同事的知遇,倏指难穷。

我于1979年进师院,并无职称。1982年初评职称,3月4日晚八点一刻,中文系赖淮靖副主任来到我房里,说:“系学术评议小组会上,有老先生提议,根据你的学术水平,应该评副教授。系领导也都同意。”但他说,系领导为了保险,主张还是先报讲师,因此由他特来说明。我自然表示感谢——这是我最早从领导和前辈处得到的知遇。

过了几年,我不安于位,决意离去。苏州大学由于钱仲联先生的推荐,立刻向师大人事处发来商调函。同时,江西大学谷霁光校长知道我的遭遇后,也叫我去找郑光荣书记,请他同意调我去江大。我找到郑书记提出要求。他说:“我们既然要你来,怎么又会放你走。不行,你哪里也不能去,一定要在这

里安心工作。”不久,就要我卸去本科生的教学工作,协助刘方元副主任专门指导先秦至南北朝文学硕士生。

1988年下半年,郑书记调任省文化厅厅长。9月17日下午5点半,我从系里回家去,经过校办公大楼门口(当时门向东开),他正站在大门台阶上,见到我,忙招呼我过去,说:“我已到文化厅上班三周了。”又说:“全校到年龄的六十五人,都办离、退手续,只留下你。我已经跟校领导们说了:你带研究生有很大成绩,有真才实学。留下来,一方面为了增加你的工龄,更主要的是让你在古典组挑重担,接胡守仁先生的班。”当然,后来由于政策规定,除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和省政协常委外,一律都退,于是我没被延聘。但郑书记这样关怀,我是没齿不忘的。

我退休十年了,历届领导不论认识不认识,大概都知道我这个人,邵逸夫肖像瓷盘上的七律诗,《逸夫楼记》,都是叫我代学校撰写的。尤其是最近的《田家炳教育书院记》校办请我定稿(初稿由段小华教授创作),以七天为期,务期斟酌尽善。校领导要求既赞颂田先生,又不能贬低师大。为了这,我几次凝思不眠,有时想到了,半夜跃起,援笔记下,次日审视,仍觉不洽,重新改写。“本期经营尽善,书院丕成;乃以兴作方繁,资金顿绌。”这样措辞,是颇费苦心的。另外,姚电副校长不满“救一时燃眉之急”,认为自贬太甚。我为了对“收百年树人之功”,便用《左传》“晋饥,秦输之粟”的典故,写成“同两国饥粟之谊”。后因大批“两国论”,怕引起误会,匆忙改成“古贤”,用鲁肃为周瑜指困事。惭愧,费了五天时间交卷,仍未斟酌尽善,深负倚托。但据校办罗敬新主任说:田先生非常重视这篇记文,刻石之前,叫先电传过香港去,经他本人和田家炳教育基金委员会的委员们审读后,才让刻石。罗主任说:“他们在电话里说,非常满意。”

退休后,我仍然常去样本书库看书。一天,钟世德书记、李佛铨校长陪舒圣佑省长来校视察,走进样本书库。李校长特地叫我过去,向舒省长介绍:“这位是刘世南教授,学问渊博,孜孜不倦。”我并不以省长一赐颜色为荣,却对李校长的揄扬踌躇不安:孜孜容或有之,渊博谈何容易。

二十年来,我的身影停留得最多的地方,是校、系两图书馆。由于蓄意撰写《清诗流派史》,我要求校图购买《晚晴簃诗汇》。这是一部大部头的书,私人买不起。张杰先生时任馆长,不但同意,而且买了两部,分给中文系一部,我便得以随意借阅。后来,钱仲联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出版了,也是册数较多的,我又向张馆长要求,他又满足了我的愿望。

先母 94 岁弃养后,我老伴又不幸伤脚,从此里外靠我一手撑持,不但不能去校外讲课,连外出开会和春秋旅游也不能参加。近两年,省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领导小组正组织全省高校教师做《豫章丛书》的点校工作,聘请舒宝璋先生和我担任首席学术顾问,负责全部丛书的定稿。这是十分繁重的工作,我已 76 岁,家务又如此沉重,实在无法受聘。领导小组组长万萍教授,反复劝说,最后说:“刘先生,你在中文系是用而未尽其才的,我们这样敦请,实在希望人尽其才啊!”我确实被这话感动了,自知材材,无足轻重,但良朋相知如此之深,岂容轻负,于是勉强应聘了。

最后,我想到傅修延副校长,他对我的扶持是长期的、多方面的。最难忘的是 1996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10 点半,他邀我到他家,把贮存在电脑中的日记显示给我看,称我为“大学问家”(近年来,我在东北师大古籍研究丛刊上连续发了多篇匡谬文章,他看过了,所以如此过分揄扬),叹息我刘蕢下第,李广不侯,比我为黄秋园,说是百年之后必获真赏。

江西师大啊,您赋予我难忘的二十年! 没有您,就没有我

的所有专著和论文,也没有我的存在意义。

感谢您,但愿我能在您的怀抱里,严肃而愉快地走完这人生的长途。

我为什么这样写?并非借他人之口,来作自我吹嘘,而是对种种冷箭的总回答。我当时不仅背后受到种种冷箭,而且竟被剥夺给本科生上课的权利,把我调到《读写月报》(指导中学语文教学的刊物)去当编辑。实逼处此,我才不得不要求调到其他大学去。由于校党委书记郑光荣的慧眼,他果断地留下了我。

我安心工作后,除了认真带好研究生,就是全力研究并撰写《清诗流派史》,而对本人职称,不愿多加考虑。我是1989年3月1日退休的,这时我已67岁,早已过了规定的退休年龄。那时,全校正在申报正高,和我同带研究生的原中文系副主任刘方元先生几次私下劝我申报,我都不曾申报,觉得实至名归,这事应该由组织上去考虑。后因我在退休之列,便未再议职称事。记得当时中文系一位曾老师,一位赖老师,都因为没评上正高,先后去找郑书记。事后,两位老师先后对我说:郑书记对他们讲,“刘世南老师那么好的学问,也没有评教授,他从来没找过组织。你跟他比比,还有什么不服气的呢?”

我告诉读者这些事,用意在于说明,学术研究决不可以徇利禄。我不是教授,可江西高校了解我的人,没有谁不尊重我。很多文史教授经常不耻下问,和我共析疑义,并在他们的著作序、跋中屡屡提及贱名。

最近读到吕家乡先生的《探求:知识分子的天职》:“如果一个有知识的人用他的知识作为追逐名利、巴结权贵的工具,他就很容易失去知识分子应有的探求真理的精神,就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了。”(《文艺争鸣》2002,4)我以为学人应该这样要求自己。

没有文化的民族不是真正的民族,而泡沫文化只是文化垃圾。

我希望读者尤其是年青读者谨记此言，抛开个人的浮名浮利，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为宏扬我中华传统文化和开创与世界接轨的新文化而努力，这才是我们人生价值之所在。

现在再回到张仲谋《综述》上。

在《清诗流派史》出版后，已有好几篇书评，为什么我独对张文如此感动呢？原因有三：

(1)那些书评作者大多是我的熟人，他们是得到赠书后才写书评的，不免有溢美之辞。

(2)张仲谋博士却和我素昧平生，我得到朱则杰教授寄来的复印件时，初读一过，只觉惊喜，却不知道他是在哪个高校读的博士生，导师是哪位。这样的陌生人写的《综述》，对我的专著所做的评价，丝毫不带私人感情，应该是客观的。

(3)没过几天朱则杰教授第二次来信，说张君是苏州大学严迪昌博导的博士生，这就更使我高兴。因为苏州大学是全国的清诗研究中心，俗话说，同行相妬。我在《清诗流派史》末页所附五古说：“不知问世后，几人容清玩？得无温公书，无人读能遍？”又说：“并世得子云，应与话惘然。”潜台词正是担心他们会视而不见或故意贬低。而张博士在1999年即已发表这篇《综述》，肯定拙著的价值，丝毫不象刘勰在《知音》篇所说：“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而是真正“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平理若衡，照辞如镜”。这怎么不使我分外感动呢？特别是最近（2002年7月）看到张博士的专著《清代文化与浙派诗》，深觉他是清诗流派研究的行家里手，拙著能得到这种学人的赏音，实在自幸之至，不禁想起我省高安籍诗人白采（童国章）的一首七绝：“负手微吟解者谁，语高元不合时宜。文章真赏须千载，独遣伤心为此时！”正是伤并世子云之难遇。和白采相比，我何能不自幸？我还想起清代诗人彭兆荪（甘亭）的两句诗：“世间嗤点皆寻常，誉我我转心爽伤。”的确，内行一句中肯的指责，远远胜过外行的众口交誉，何况是内行的称赞？